

辛亥革命史

十一册

本册主编：林增平 肖致治
冯祖贻 刘望龄

人 民 出 版 社

辛亥革命史

上册

本册主编：林增平 肖致治

冯祖貽 刘望龄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印张 344,000字
1980年3月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

书号11001·385 定价2.20元

辛亥革命雜錄

一

同盟領袖是中山

德會率隊到宜賓

清帝推翻民有權

高舉紅旗提弟兄

起義武昌全國應

前軍達到自流井

掃除封建幾千年

已報成都敵肅清

二

雲南起義是重陽

羣衆爭修鐵路權

下定決心援武昌

志同道合會全川

經過多時諸運動

排山倒海人民力

功成一夜好開場

引起中華革命先

三

生擒總督李經羲

列寧評論大文章

喪失人心莫敢支

指出中國革命方

只要投降即免死

先進亞洲從此始

出漢祀送亦宜之

發揚真理更輝煌

四

新逃鍾元人稱快

中山革命未完成

舉出都督是蔡鈞

共產黨人應運生

五華山上樹紅旗

階段分明仍不斷

出師兩路救川鄂

紅旗三面正高擎

五

朱德

一九二九年
十月廿六

编写说明

早在四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即曾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需要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以后又倡议，应当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史学工作者遵循上述教导，对中国近代史事作了大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许多可喜的成绩。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来说，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董必武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经常关怀和指导下，曾出版了大批的文献资料和回忆录，并且有若干富于学术价值的论著问世。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更有力地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这次会上，吴玉章、范文澜等同志，还深情地希望年轻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努力工作，加强协作，尽快撰写一部分量较大的辛亥革命史专著。但是，随后几年由于“四人帮”的肆虐史坛，使有志于此的史学工作者无法从事这一项编撰任务。

1976年，人民出版社约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邀集一些单位共同编写辛亥革命史。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这个编写组得以日益顺利地开展工作。经过将近三年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几易其稿的编写任务，陆续交人民出版社分册付印。

宋庆龄副委员长关怀本书的出版，特地为本书封面题签。

全书分三册：上册记述 1901—1905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加速酝酿和向全国发展的形势；为说明近代中国社会为这一革命运动所作的历史准备，追溯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初步发展，以及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前后的活动。中册记述 1905 年同盟会成立到 1911 年保路风潮勃兴猛涨的史事，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普遍发动和趋向高潮的过程。下册记述 1911 年武昌首义到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北迁的经过，阐明革命取得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及其终于失败的原委；为了以史实反复印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得到成功的历史规律，还简略地综述了从“二次革命”到护法运动的梗概。

参加本书编写组，撰写过篇幅不等的初稿的有（按单位笔画为序）：四川大学历史系隗瀛涛、李润苍、钱安靖；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章开沅、陈辉、刘望龄、彭英明；武汉大学历史系彭雨新、肖致治、崇汉玺；武昌造船厂几位工人同志；河南省历史研究所王天奖、李国俊；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吴雁南、倪英才；贵州红湖机械厂几位工人同志；湖北财经学院政治系谭佩玉、袁继成、虞师；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林增平、彭祖珍、王永康、石振刚、刘湘雅。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家有同志应邀为我们撰写了有关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参与辛亥革命运动的书稿。

全书由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负责三册定稿工作。

上册主编：林增平、肖致治、冯祖貽、刘望龄；中册主编：隗瀛涛、吴雁南；下册主编：王天奖、刘望龄。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冯祖貽同志协助中、下册定稿工作。

人民出版社林言椒同志参加了本书从组织人力到修改定稿的全部工作，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湖北、湖南、贵州、四川、河南省委宣传部、文教办（组）的关怀和支持，得到编写组各成员所在单位党组织的具体领导，并得到各地有关单位和同志的热情协助。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应当说明，由于编写组成员极为分散，相距遥远，而且大多另有本职工作，所以本书基本上未能集中编写。参与定稿的人员虽然通力合作，也很难经常充分交换意见；再加上编者理论、业务水平不高，时间也较短促，有的章节是在研究不足的基础上赶写的。且各单位其他任务日益繁重，已不容许我们抽出更多的时间对全书再作一次全盘详尽的推敲和修改，因此，错误和缺点一定不少。我们诚恳地期待着各方面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帮助我们在五——六年内重新作一次力所能及的修订，使这部不够成熟的书稿得到应有的提高。

目 录

编写说明.....	1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1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初步发展.....	1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准备.....	1
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	12
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24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困难	30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	37
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	37
早期官僚资产阶级	43
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	53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	59
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	66
第三节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74
孙中山早期思想和活动.....	74
兴中会的创立和乙未广州起义	86
寻求救国真理，坚持革命方向	95
庚子惠州之役	104
第二章 二十世纪初深重的民族灾难.....	115
第一节 帝国主义“灭国新法”.....	115
从瓜分到“保全”	115

“不劳兵而有人国”	123
“保全”下的霸权争夺	137
第二节 “洋人的朝廷”	148
清朝统治的进一步买办化	148
假维新，伪变法	164
袁世凯与北洋军阀	185
第三节 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	204
农民的血泪	204
工人的辛酸	215
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困穷	223
少数民族人民的苦难	229
海外华侨的飘零	240
第三章 群众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新形势	255
第一节 此起彼伏的广泛斗争	255
“扫清天洋”和“天清剿洋”	255
城乡人民的纷纷发动	264
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	291
第二节 会党起事和边疆烽火	297
秘密会社的发展和广西会党起义	297
各族人民的反帝武装斗争	323
第三节 1905 年的反美爱国运动	331
反美爱国运动的迅猛发展	331
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破坏	341
资产阶级的退让与小资产阶级、工农群众的坚持斗争	350
中国正处在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	361
第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发展	368
第一节 爱国和革命	368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出现	368

留学生运动	380
国内学潮与《苏报》案	393
大击保皇毒焰	404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活动	420
革命书报的大量发行	420
邹容与《革命军》	435
陈天华与《猛回头》、《警世钟》	447
章炳麟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457
第三节 革命团体的相继建立	466
黄兴与华兴会	466
科学补习所	477
光复会	486

第 一 章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 和资产阶级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 和初步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准备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领导的，力图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去取代腐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以达成外御列强，内建民国的奋斗目标的革命运动。因此，这次革命的兴起，运动的规模和归宿，就不能不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以及它的特点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集中表现。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于 19 世纪 70 年代，到本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进入了它的初步发展阶段。在兴起前，中国资本主义也经历过一段萌芽和原始积累的历史准备过程。对这个历史准备过程加以探讨，是研究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前提。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依据较足征信的记载进行考

察,大约从明朝(1368—1644年)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起,在我国幅员广阔的疆域里,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方面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就已经是依稀可辨的社会现象了。尔后,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浸润延续,到清朝(1644—1911年)的乾隆、嘉庆之际,即鸦片战争的前夕,这种萌芽更显出了蔓延孳生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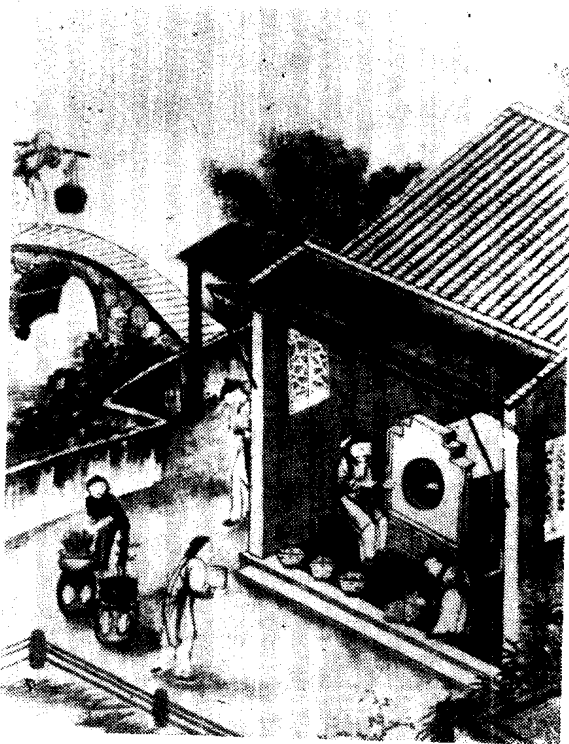
手工业里素负盛名的江南一带的丝织业,有颇多的史料可以证实,明代后期就已明显地表现了孕育着资本主义的一些征兆。^②与此同时或迟至清朝的中叶,在一些地区的棉纺织业、制瓷业、造纸业、制糖业、榨油业、冶铁业、采煤业……等等行业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手工工场和作坊,逐渐地有所增多;包买商控制小生产者的活动,也次第有所扩大。^③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而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一版本(下同),第589页。

② 据《明神宗万历实录》卷361,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应天巡抚曹时聘奏称,苏州的丝织业里“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在这种“机户出资”的作坊或手工工场里“出力”的“机工”,已有数千人之多。到清中叶后,南京城厢内外,“乾、嘉间(织)机以三万余计”,“至道光间遂有开五、六百张机者”。(同治《上元江宁两县志》卷7,《食货考》)在苏州,清康熙后商人开设的丝织行称作“帐房”,“各帐房除自行设机督织外,大都以经纬交与织工,各就织工居处,雇匠织造”。(民国《吴县志》卷51,《物产》2;又见陈作霖:《凤麓小志》卷3,《记机业》第7)足见“帐房”既自行设有从事雇佣剥削的作坊或手工工场,又兼有控制小生产者的包买主的职能。

③ 棉纺织业在东南沿海省分已有一部分逐渐卷入商品生产的范畴。据统计,19世纪初至30年代,棉布除国内市场外,还有一定数量由英、美商人从广州贩运出口,多数年份出口额在百三十万匹左右(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955年科学出版社版,第16页,表14)。1833年时,广东佛山镇“从事织造各种布匹的工人共约五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们分别在大约二千五百家织布工场作工,平时每一工场平均有二十个工人”。制瓷业首推江西景德镇。据贺熙龄等《道光浮梁县志》载:“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于是豪商大沽(贾)咸聚于斯。事陶之人,动以万计”(卷首,第17页)。又沈嘉征窑民行诗云:“景德产佳瓷,产器不产手,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陶业活多人,产不与时俗。富户利生财,穷工身糊口。

相应地在农业方面反映出来的变化，是在苏杭等地稀疏地产生了经营地主，零星地出现货币地租取代实物地租的景象。而商品货币关系的渐次活跃，则促进了一些商业城市的兴盛。虽然，这一切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种种迹象，只是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里缓慢地显露出



制造瓷器的小型手工场

来，基本上没有改变当时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但是，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萌芽只要获得迅速苗长的有利条件，它就必然会把中国导向资本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的萌芽，要获得什么样的条

食指万家烟，中外贾客数。坯房蚊蛭多，陶火烛牛斗。都会罕比雄，浮邑抵一拇”(卷21，第24页)。足见景德镇制瓷业的繁盛，商业资本的活跃。至于造纸、制糖、榨油、冶铁、采煤等行业里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详见于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1编，《十七世纪后半期和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者匠籍身分的解放与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第4章（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99—390页）。以上织布业、陶瓷业情况也引自此一章。

件才能迅速地茁壮成长呢？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崛起的历程作过详细的论述。马克思指出，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出现的，^①但是，如果不是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摆脱萌芽状态那种“蜗牛爬行的进度”^②，导致取代封建主义的胜利。所以，马克思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③正是基于这种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就都先后开展凭借暴力来进行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征服殖民地，对殖民地居民施行残暴的劫掠和屠杀；从事争夺海上霸权的商业战争；利用国家权力，在各自的国度里剥夺农民的土地，推行国债制度、重税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大大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生产方式的过程。经过如此一系列“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④的资本原始积累，以资本家占有近代机器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在西欧各国建立起来。

正当欧洲各国在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的刺激下从事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中国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王朝的极端专制主义的统治，仍然在严密地压抑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尤其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下同），第784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8页。马克思写道：“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马克思指出，这种小生产者通过自发的经济力量滋长着资本主义的过程，是很缓慢的，是“蜗牛爬行的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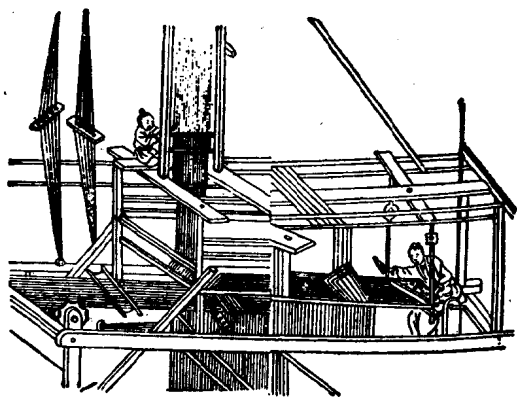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

④ 同上书，第783页。

是 17 世纪中叶清王朝建立后所推行的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更使得这种萌芽几乎是处于同世界市场基本上隔绝的境地。这样，从明代中叶以后就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三个世纪，始终没能越出那种蜗牛爬行式的缓慢行程，因而它本身也还不能具备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趋于解体的力量。

尽管清朝封建统治者竭力要使中国同西方世界保持基本上隔绝的状态，可是，已经从事好几个世纪殖民活动的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却越来越凶悍地撞击着中国的门户，力图把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卷进它们殖民主义市场的漩涡。于是，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等待到的不是一个促进自身迅速成长的条件，而是遭遇着一场狂暴的、毁灭性的空前浩劫。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一步一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里，手工业堪称是首先遭到外国商品的冲击和排挤的受难者。战后三、五年间，曾经很兴旺的东南各省的手工棉纺织业，就骤然显出萧条停滞的景况。福州、厦门开埠后一年（1845 年），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敬敷在一份奏折里描写：“（福建）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①又过了两年，英国对华商业关系小组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到：“中



清代织机

国人所织的白而结实的布比我们〔英国〕的货物贵得多。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布代替了他们〔中国〕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地下降了。”^②而随着侵略者的逐步深入，洋铁排挤土铁，洋糖代替土糖，轮船驱逐旧式帆船^③……年复一年的洋货涌入，土货滞销的危机，造成了很大一部分原有手工业和商业的破落和衰敝。于是，曾经在这一部分手工业里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陷入了枯萎凋谢的境地。稀疏破土的幼芽，大多数没有长成枝叶繁茂的树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主要不是从原有的手工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然而，出于侵略的需要，西方殖民主义者既破坏了中国城镇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也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因此，就在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大多数横遭摧残的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结构的逐渐分解，一个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却在中国社会经济领域里蔓延开来。当然，中国的原始积累，是与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化的灾难相辅并行的，同西欧各国有很大的差别，但其内容则基本一致，即不外乎是借助于暴力，一方面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在此一极积累起贫困；一方面是少数人基于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在彼一极积累起用以转化为

① 转引自邵循正：《1845年洋布畅销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② 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5页。

③ 如1868年宁波海关报告说：“土铁很贵，在宁波已全部为洋铁所代替了。”陈炽：《续富国策》卷1《种蔗制糖说》载：“自通商以来，洋船所带洋糖，色泽莹白，人咸爱之。旧日之糖，销路日微，销数日绌，糖商折阅，无可挽回，欲求不贫且窘也，其可得乎？”又据美国国务院存档《中国文件》记载：“自1860年长江开放汽航以来，以万计数的中国船民，都被迫退到长江的支流内去航行了。这些被迫退入支流的船民，与早已充满了支流的船民，发生剧烈竞争；在这竞争中，船民穷饿而死的，难以数计”。（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135页）

资本的财富。至于推动这种积累的暴力，则首先是来自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种种暴行。

对中国一再发动武装侵略，野蛮地烧杀抢劫，勒索大量的战争赔款，无疑是驱使中国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颠沛流离，破产失业，积累起贫困的最为露骨的暴行。^①可是，就对中国人的身心的摧残，造成中国财富枯竭的严重性来说，那种谋财害命的鸦片贸易的肆虐贻害，并不亚于武装的侵略战争。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鸦片输入数量的扶摇上升，曾经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的主要原因。^②由于“银荒”而引起的“银贵钱贱”的现象，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恶化，生计困穷的一大祸患。稍后，因丝、茶出口量的增加和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白银外流的问题才缓和下来，然而，随着殖民主义者从清统治者手里攫取到的开埠通商、圈划租界、协定关税、内河通航、内地传教……等等侵略权益的迅速扩张，各资

① 以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来说，按《中英江宁条约》，对英赔款为2,100万元，加上战争期间在广州、厦门、宁波等地的勒索和抢劫的7,302,844元，共计被英国勒索去28,302,844元，合19,811,991两（不包括英侵略军在各地抢劫的官、私财物在内）。这项赔款，相当于当时清王朝一年财政收入的1/2。加上清王朝所费军饷，计中国因鸦片战争在白银财富方面的直接损失，大约有上亿两的银数。赔款和军饷，清王朝主要从地丁、关税、盐课等税收项下拨付，一部分出自商捐。当然，各类税收因此产生的亏欠，清政府又以增捐加税来弥补；商人则以扩大盈利来补偿商捐的亏损。于是，广大劳动人民捐税负担急剧加重，受到商业高利贷的剥削也更深。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武装侵略，明显地加速了中国劳动人民贫困破产的过程。由此类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其后果均如此，而劫掠勒索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② 1847—1848年间，中国对英、美贸易上的出超为1,600万元，而由于英属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值2,300万元、棉花值500万元，造成中国对印度的贸易入超达2,600万元，以致中国每年须以白银支付的贸易逆差为1,000万元。1854年，从英国和印度输入中国的商货总值为3,360万元（其中鸦片值2,400万元），中国对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出口总值为2,570万元。中国该年仍应由于鸦片的输入而以790万元的白银来支付对英贸易上的逆差。（见姚贤贤：《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22、526页）